

Title	宋人評價 長恨歌 及其對東亞「長恨歌圖」之影響
Author(s)	I, Lo-fen
Citation	衣若芬 (2013)。宋人評價 長恨歌 及其對東亞「長恨歌圖」之影響。載於楊國安、吳河清 (主編)，第七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484-491)。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Date	2013
URL	<a href="http://hdl.handle.net/10220/42469">http://hdl.handle.net/10220/42469</a>
Rights	© 2013 《第七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This paper was published in 《第七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and is made available as an electronic reprint (preprint) with permission of 《第七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One print or electronic copy may be made for personal use only. Systematic or multiple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to multiple locations via electronic or other means, duplication of any material in this paper for a fee or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or modific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paper is prohibited and is subject to penalties under law.

# 宋人評價〈長恨歌〉及其對東亞「長恨歌圖」之影響

衣若芬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 中文系

(刊於楊國安，吳河清主編：《第七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頁484-491。)

## 一·〈長恨歌〉流傳日本和韓國

唐代詩人白居易(772-846)的名作〈長恨歌〉作於憲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在世時，詩集便已經流傳至鄰國日本及新羅(今韓國)，〈長恨歌〉也在詩集之中。白居易〈白氏文集自記〉云：「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sup>1</sup>可知日本和新羅別有傳寫的白居易詩集。

作於824年的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云：「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sup>2</sup>「雞林」即今韓國。關於雞林國對白居易詩的熱衷，李瀛(1681-1763)《星湖僿說·詩文門》〈雞林鬻詩〉云：「東人典籍不具，雖本國故事，每憑華人頰舌為證，甚可笑也。」<sup>3</sup>

李商隱〈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亦云：「姓名過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sup>4</sup>不僅韓國，越南等使用漢字的國家也得知白居易的詩名。

---

<sup>1</sup>〔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後序，頁1a。收入於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漢詩集成·唐詩》第9輯(東京：古典研究會，1978年)，總頁5。

<sup>2</sup>〔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序，頁2a。同註1，總頁5。

<sup>3</sup>俞炳禮：〈雞林鬻詩說小考〉，《中國文學研究》第5輯(1987年)。

<sup>4</sup>〔唐〕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文集》，卷8，頁212。

日本小島憲之教授指出：弘仁九年(818)成立之《文華秀麗集》所收詩已見〈長恨歌〉；丸山清子教授則從《日本文德天皇實錄》上的記載，把承和五年(838)大宰少貳藤原岳守從唐商人帶來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詩筆》獻給仁明天皇的史實，視為白居易詩傳入日本的證明。<sup>5</sup>

## 二，現存日本及中國的「長恨歌圖」

根據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編《歷代著錄畫目》，中國古代有以唐明皇和楊貴妃為題材，表現「明皇夜遊」、「貴妃出浴」的作品，但未見專畫「長恨歌」的圖繪。

1929年第一屆全國美展中，李毅士(1886-1942)的「長恨歌畫意」受到普遍好評。李毅士的父親李寶璋為清末畫家；叔父李寶嘉著有《官場現形記》，他留學英國學習美術及物理。「長恨歌畫意」共30幅，每幅22.5×17公分，紙本單色水粉，現藏中國美術館。圖中服飾、宮殿陳設等以北京故宮為藍本，採用明制，故定名為「畫意」。「長恨歌畫意」1932年曾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共印行過九次。<sup>6</sup>

李毅士的「長恨歌畫意」廣受歡迎，不過魯迅對之卻嗤之以鼻。他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信：

漢唐畫像石刻，我歷來收得不少，惜是模糊者多，頗欲擇其有關風俗者，印成一本，但尚無暇，無力為此。先生見過玻璃板印之李毅士教授之《長恨歌畫意》沒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屋，實乃廣東飯館與『梅郎』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畫數千年前之中國人，就已有了辮子，而且身穿馬蹄袖袍子乎。介紹古代人物畫之事，可見也不可緩。<sup>7</sup>

日本自平安時代(794-1185)起，即有長恨歌屏風和繪卷。例如伊勢(872-938)《伊勢集》有長恨歌屏風之歌。《後拾遺集》中道命法師(974-1020)〈徒然

---

<sup>5</sup>小島憲之：《國風暗黒時代の文學 中(上)―弘仁期の文学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塙書房，1973年)。津田潔：〈承和期前後と白氏文集〉，太田次男等編集：《白居易研究講座》(東京：勉誠社，1993年)，丸山清子著，申非譯：《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新聞一美：《源氏物語と白居易の文学》(大阪：和泉書院，2003年)。興膳宏著，李寅生譯：《中國古典文化景致》(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9。有關〈長恨歌〉流傳日本之情況，感謝下定雅弘教授指教。

<sup>6</sup>《長恨歌畫意》(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說明〉。

<sup>7</sup>許廣平：《許廣平憶魯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108。

草)和歌的題詠上,提到了長恨歌的繪畫。紫式部(?-1016)《源氏物語》第一帖〈桐壺〉有言:「皇上看了長恨歌畫冊。」第十七帖〈繪合〉:「遂令人開啟二條院府邸的書櫥…其中,長恨歌、王昭君等畫卷雖亦哀艷感人,不過總嫌其不吉利,所以這次避免呈獻,特為除下。」菅原孝標女(約 1108-1059)著《更級日記》有長恨歌畫冊。<sup>8</sup>

目前存世的日本長恨歌圖畫,作品年代可上溯至桃山時代(1573-1603)。例如狩野山雪(1560-1651)的「長恨歌畫卷」,現藏愛爾蘭 Chester Beatty Library。作品共兩卷,上卷縱 31.5 公分,長 1048.5 公分,畫自〈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至「翠翹金雀玉搔頭」的場面。下卷縱 31.5 公分,長 1070 公分,畫自「君王掩面救不得」至「此恨綿綿無絕期」的內容。

狩野山雪是狩野派畫家狩野山樂(1559-1635)的門人及女婿,秉承京都狩野派繪畫的裝飾性風格,加上個人喜好歷史文化,作品富有「學究」氣息。狩野山雪「長恨歌畫卷」的文本依據,從「夜雨聞鈴腸斷聲」句,狩野山雪作「夜雨聞猿斷腸聲」判斷,根據的即是日本金澤系的舊鈔本<sup>9</sup>

到了江戶時代(1603-1867),「長恨歌」主題繪畫更加興盛。<sup>10</sup>直至二十世紀,「長恨歌」仍然為日本畫家喜愛的題材,橋本關雪(1883-1945)的「長恨歌圖」便是一例。

橋本關雪出生於神戶,曾經入竹內栖鳳(1864-1942)的畫塾「竹杖會」,並且從父親學習漢學,作品喜用中國題材,呈現所謂「支那趣味」。「長恨歌圖」現藏京都市美術館,為五面繪卷,前綴〈長恨歌〉詩句,紙本墨畫金彩,總長為 47.0×659.9 公分,作於昭和四年(1929),曾經於第十回帝展中展出。學者對於橋本關雪「長恨歌圖」的研究,多集中於其成熟的線描法對中國和日本繪畫的繼承,以及所營造的中國風情。

---

<sup>8</sup>周相錄:《長恨歌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 181-187。

<sup>9</sup>狩野山雪画;神鷹徳治,袴田光康解説;神鷹あかり英訳:《長恨歌画卷:チェスター・ビーティー・ライブラリィ所蔵》(東京:勉誠出版,2006年)。有關此圖之研究,詳參林麗江:〈此恨綿綿無絕期——狩野山雪的〈長恨歌圖〉研究〉,收於石守謙、廖肇亨主編:《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月),頁 539-600。

<sup>10</sup>福田訓子:〈玄宗・楊貴妃画題の受容と新展開——室町末から江戸初期を中心に〉,仲町啟子編:《「仕女図」から「唐美人図」へ》(東京:實踐女子学園,2009年)。

至於韓國的長恨歌圖繪，根據秦弘燮編著《韓國美術史資料集成》，和中國一樣，未見圖繪〈長恨歌〉的作品，只有「楊太真沐浴圖」、「明皇翫花圖」等畫題。

1441年朝鮮世宗大王敕命圖畫玄宗楊妃故事，書寫規戒文字，定名為「明皇誠鑑」，文臣朴彭年(1417-1456)作〈明皇誠鑑序〉云：

上曰：古人圖明皇楊妃之事者頗多，然不過以為戲玩之資耳，予欲採開元天寶成敗之迹，圖畫以觀，昔漢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飲，豈非令世主鑑前轍，以自戒耶，明皇號稱英主，而晚年沉於女色，以至於敗，始終之異，未有如此者，至於遊月宮，見龍女楊通幽等事，極為誕妄然，朱子於綱目，亦書，帝聞空中神話，以見明皇好怪以實，凡此等語，亦有國家者之所深戒耶，乃命儒臣，編集圖形，間附先儒詩論，名曰明皇誠鑑。<sup>11</sup>

如前所述，古代中國和韓國幾乎未有「長恨歌圖」；反觀日本，不但圖繪〈長恨歌〉以欣賞，並且歌詠讚嘆，藉由圖繪裨益〈長恨歌〉的傳布。其間之差異，筆者以為乃肇因於對〈長恨歌〉的評價。

### 三，宋代〈長恨歌〉評價及影響

白居易在世時〈長恨歌〉風靡一時，晚唐和宋代的文人卻從文章世道的立場對〈長恨歌〉展開了嚴厲的批判，並且影響韓國，其要點如下：

#### (一)〈長恨歌〉用事失據

沈括《夢溪筆談》：「白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sup>12</sup>宋人詩話中經常可見對於前人詩歌內容的實情考察，歐陽脩《六一詩話》談到張繼〈楓橋夜泊〉詩「夜半鐘聲到客船」，指出「三更不是打鐘」，認為是「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對於〈長恨歌〉的評論也是基於同樣的態度，明皇幸蜀未到峨嵋山，白居易詩顯然不符史事。

#### (二)〈長恨歌〉豔麗穢褻

---

<sup>11</sup>李肯翊(1736-1806)《燃藜室記述》卷3，見秦弘燮編著：《韓國美術史資料集成》(一志社，1998年)，第6冊，頁311。

<sup>12</sup>[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卷23，頁227。

杜牧(803-852)為李飛(又名李戡)作的墓誌銘云：

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人雅士，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sup>13</sup>

杜牧的譏評，涉及元稹(779-831)、白居易和張祜的恩怨，此不贅言。<sup>14</sup>黃滔(?-911)後來辯駁道：

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嶽干天。然自李飛數賢，多以粉黛為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五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至如〈長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陰陽失倫。其意險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哉。<sup>15</sup>

黃滔的意見似乎不被宋人採納，尤其針對〈長恨歌〉，和杜牧持相同看法者比比皆是。

杜牧的觀點影響到朝鮮，李睟光(1563-1628)《芝峰類說》卷九云：

杜牧之謂「白居易詩纖豔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語，入人肌骨，不可去」。余謂少杜此言，蓋有所見。而自為詩亦多豔體媠語，何也？<sup>16</sup>

李睟光引述了杜牧的話，從而反省杜牧的詩風與白居易詩的關係。

朝鮮李德懋〈婦儀〉也認為：「諺翻歌曲，不可口習。如唐人詩長恨歌之類，豔麗流蕩，妓女之所誦，亦不可習也。」<sup>17</sup>

宋代張戒《歲寒堂詩話》批評：「〈長恨歌〉，雖播於樂府，人人稱頌，然其實乃樂天少作，雖欲悔而不可追者也。其敘楊妃進見專寵行樂事，皆穢褻之語。」<sup>18</sup>

---

<sup>13</sup>〔唐〕杜牧：〈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樊川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正編》本)，卷9，頁2-3。

<sup>14</sup>參看陳友琴編：《白居易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刷)，頁3-4。

<sup>15</sup>〔唐〕黃滔：〈答陳礪隱論詩書〉，《唐黃御史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正編》本)，卷7，頁4。

<sup>16</sup>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年)，第2冊，頁294。

<sup>17</sup>李懋德：《青莊館全書》(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年)，冊257，卷30〈婦儀〉，頁518。

朝鮮張維(1587-1638) 和張戒的觀點一致，有謂：

白樂天作長恨歌，說盡宮中行樂。至於閨閣密誓，非外人所可知，而亦及於詩中，可謂甚矣。洪武中。監察御史張尚禮作宮怨詩「庭院沈沈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却被黃鸝叫一聲。」高皇帝以其摹寫宮闈心事，下蠶室死。樂天之詩，當時未聞以為非；而尚禮宮怨，自是詩人恒言，至不免坐死，所遭之時異也。然後之君子。當以尚禮為鑑戒。不當以樂天褻語為風流才致也。<sup>19</sup>

### (三)〈長恨歌〉無規鑑大義

洪邁《容齋隨筆》云：「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它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sup>20</sup>

張邦基《墨莊漫錄》也對比〈長恨歌〉和元稹的〈連昌宮詞〉，肯定〈連昌宮詞〉的規鑑意義大於〈長恨歌〉：「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謂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為優也。」<sup>21</sup>

朝鮮魏伯珪 (1727-1898)的見解和洪邁等人相近，嚴厲指責白居易詩之不當：

長恨歌膾炙今古，然如此文字萬不關係於世道，非戲非刺非諷，只是蕩人意惹悲緒而已。況起句漢皇重色思傾國等語，非臣子所敢亂道者。其末則又以道士金盒不經之語終之，是誠詩家之罪人也。<sup>22</sup>

---

<sup>18</sup>〔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上，頁12-13。

<sup>19</sup>張維：《谿谷漫筆》，卷1，頁53a-b。收於《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總頁711-712。張尚禮事見明代蔣一葵《堯山堂外紀》。

<sup>20</sup>〔宋〕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上冊，卷15〈連昌宮詞〉，頁200。

<sup>21</sup>〔宋〕張邦基著，孔凡禮點校：《墨莊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卷6〈元微之連昌宮詞〉，頁177。

<sup>22</sup>魏伯珪：《存齋集》，卷15〈白居易〉，頁5b。收於《韓國文集叢刊》，冊243，總頁317。

有少數高麗時代的詩人，例如李奎報(1168-1241)，對白居易詩大加褒揚：

予嘗以爲殘年老境消日之樂，莫若讀白樂天詩。…白公詩，讀不滯口，其辭平澹和易，意若對面諄諄詳告者。雖不見當時事，想親觀之也，是亦一家體也。古之人或以白公詩，頗涉淺近，有以囁嚅翁目之者，此必詩人相輕之說耳，何必爾也。其若琵琶行、長恨歌，當時已盛傳華夷，至於樂工倡妓，以不學此歌行爲恥。若涉近之辭，能至是耶。嗚呼，凡譏議樂天者，皆不知樂天者也。<sup>23</sup>

整體而言，白居易詩在韓國的評價仍然不高，遠遜於在日本的風靡情況，尤其是批評白居易佞佛，以及文字纖麗淺俗，無補世道。對於白居易的負面觀感，〈長恨歌〉在韓國不受重視，必然影響畫家繪製「長恨歌圖」的意願。

#### 四，「明皇幸蜀」圖繪與〈長恨歌〉

雖然中國未見專門圖繪〈長恨歌〉的畫作，但是有延續過去「按樂」、「夜遊」、「醉歸」等帝妃行樂的題材，還有涉及安史之亂的「明皇幸蜀圖」。

宋代周輝(1127-約 1200)《清波雜志》記其舅氏張必用家藏唐代諸帝全身小像，其中的玄宗便為「幅巾跨馬，左右侍衛單寡，有崎嶇塗路之狀。」<sup>24</sup>此即「明皇幸蜀」之狀。

再如朱翌(1097-1167)、李綱(1085-1140)、曹勛(1098-1174)、陸游(1125-1210)、劉克莊(1187-1269)等人，都有「明皇幸蜀」畫作的題詩，借古諷今。例如李綱的〈題伯時明皇蜀道圖〉，便感嘆「九重徼衛復誰勤，萬里艱危真自取。至尊狼狽尚如此，歎息蒼生因豺虎。千秋萬歲不勝悲，玉輦金輿盡黃土。空令畫手思人神，一寫丹青戒今古。」<sup>25</sup>

比起「無規鑑大義」的〈長恨歌〉，「明皇幸蜀圖」顯然深刻得多。值得注意的是：記錄北宋內府繪畫藏品的《宣和畫譜》中，並無題為「明皇幸蜀圖」

---

<sup>23</sup>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卷 11〈書白樂天集後〉收於《韓國文集叢刊》，冊 2，卷 4，頁 244。

<sup>24</sup>〔宋〕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 7〈唐帝像〉，頁 305。

<sup>25</sup>〈題伯時明皇蜀道圖〉，〔宋〕李綱著，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長沙：岳麓出版社，2004年)，上冊，卷 16，詩 12，頁 197。



的作品。據葉夢得（1077-1148）《避暑錄話》，徽宗時由於「明皇幸蜀」的畫題有影射皇帝之嫌，因而不敬獻：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復，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為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旁瓜圃，宮女有即圃採瓜者，或諱之為「摘瓜圖」。<sup>26</sup>

以「摘瓜圖」為線索，在《宣和畫譜》中有三本：畫家分別為展子虔(卷一)、李公麟「摹唐李昭道摘瓜圖」(卷七)，以及李昭道(卷十)。李昭道為李思訓之子，「父子俱以畫齊名，官至中書舍人，時人以『小李將軍』稱，智思筆力，視思訓為未及，然亦翩翩佳公子也。」<sup>27</sup>《宣和畫譜》對李昭道「摘瓜圖」主題的敘述為：「武后時殘虐宗支，為宗子者亦皆惴恐，不獲安處。故雍王賢作〈黃臺瓜辭〉以自況，冀其感悟，而昭道有『摘瓜圖』著戒，不為無補爾。」

章懷太子李賢作〈黃臺瓜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sup>28</sup>意謂武則天一再殘殺宗室諸子，子孫恐將斷絕。

既然「摘瓜圖」的主旨與武則天有關，隋代畫家展子虔的「摘瓜圖」畫的必然不是與之相近的內容，除非畫家之名有誤。而李公麟臨摹的李昭道畫作，如果即是內府所藏，則也不會牽涉到「明皇幸蜀」。

葉夢得所說的，以「摘瓜圖」取代「明皇幸蜀圖」畫題的作法，獲得後人及學者採信<sup>29</sup>，認為是故意「隱題」的結果。筆者則發現：以「摘瓜圖」取代「明皇幸蜀圖」的說法發生於北宋末南宋初，其實流傳不廣，金元詩人如元好問、張昱題「摘瓜圖」皆本李賢〈黃台瓜辭〉而非「明皇幸蜀圖」。順著「摘瓜圖」的脈絡考察，韓國未見「摘瓜圖」；日本的「摘瓜圖」，例如橋本關雪的作品，則與明皇貴妃無關。

---

<sup>26</sup>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下，頁695。

<sup>27</sup> 《宣和畫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0，頁122。

<sup>28</sup> [宋]歐陽修、宋祁等：《新校本新唐書》(台北：鼎文出版社，1973年)，卷82，頁3618。

<sup>29</sup> 古原宏伸：〈唐人「明皇幸蜀圖」〉，《奈良大學紀要》23號(1995年3月)，頁161-182。

那麼，現存的「明皇幸蜀圖」，是否可能是〈長恨歌〉的內容，鑑於「隱題」而佚失畫家旨趣呢？筆者比對了台北故宮博物院、日本大和文華館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明皇幸蜀」相關圖繪，認為大和文華館本和台北故宮本有關，可能是同一樣式的後代摹本；大都會博物館本則可能畫的是〈長恨歌〉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的場景。<sup>30</sup>

因此，不能排除「明皇幸蜀圖」與〈長恨歌〉的關聯性。

## 五，結語

本文從白居易〈長恨歌〉流傳日本和韓國的情形、「長恨歌圖」的繪製記載，探討了〈長恨歌〉的經典化過程。

白居易在世時，詩名便揚播海外，在日本，〈長恨歌〉的流傳與「長恨歌圖」相輔相成，形成三種畫系：

1. 「長恨歌畫系」：唯美浪漫，重視明皇貴妃悲戀故事。
2. 「勸戒畫系」：信西入道(1106-1159)在「長恨歌繪」表達了對後白河法皇的諷諫之意。
3. 「唐風俗畫系」：江戶時代行樂圖風俗畫，喜畫明皇楊妃及長安。<sup>31</sup>

而在韓國，先是傳說有「雞林鬻詩」之盛，後來批判白居易詩，觀點與宋人大同小異，故而不見專門圖繪〈長恨歌〉，唯有「楊貴妃圖」等相關題材畫作，重視規鑑作用。

此外，同在安史之亂的時代背景下，題為「明皇幸蜀」的圖畫，也可能和〈長恨歌〉有關。

中國、日本和韓國對〈長恨歌〉的接受和圖繪表現，筆者以為還基於對白居易「一篇長恨有風情」詩意的解讀。所謂的「風情」，意謂明皇楊妃的戀情？抑或詩人的諷喻之意？

---

<sup>30</sup>衣若芬著，森岡ゆかり譯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本「明皇幸蜀圖」と白居易「長恨歌」〉，(日本)《白居易研究年報》第11號(2010年12月)，頁161-179。

<sup>31</sup>武田恆夫：〈玄宗皇帝繪〉，《國華》1049號(1982年3月)，頁13-25。

綜觀歷來的解讀內涵，中國和韓國學者支持「諷喻說」<sup>32</sup>，日本學者則支持「戀情說」<sup>33</sup>。此種歧異的現象，使我們看見中國文學經典在東亞產生的特殊文藝圖景與風貌。

---

<sup>32</sup>金卿東：〈白樂天과 高麗文人—傳來와 受容을 中心으로〉，《中國文學研究》第 10 輯(1992 年)，頁 219-254。張中寧：《白居易《長恨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sup>33</sup>靜永健著，劉維治譯：《白居易寫諷諭詩的前前後後》(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下定雅弘：〈解讀《長恨歌》——兼述日本現階段《長恨歌》研究概況〉，《南開學報》2009 年第 3 期，頁 72-81。